

讀陳立夫回憶錄——成敗之鑑

● 千家駒（名作家）

譽滿天下毀滿天下

對於陳立夫先生真可謂「譽滿天下，毀滿天下」。我是沒有資格對他的生平加以評論的。

因為立夫先生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共黨的勁敵」，而我這一輩子追隨共產黨，為共黨的同路人。但是我自文化大革命以後，卻已看破了社會主義的「紅塵」，也看清了毛澤東的真面目。一九八九年後，我在星雲大師的主持下，皈依三寶，成了一個佛教徒。我寫了一本書名：《從追求到幻滅》，記述我幼年即嚮往共產主義，而終于理想幻滅。立夫先生也已歸隱林泉，不再過問政治。我們都已到了耄耋之年，不過立夫先生還長我九歲。儘管我們過去政治立場是對立的；而政治地位更炯然不同。他是黨國要人，而我不過一介書生。經過了這幾十年的風風雨雨，真可以說是「相逢一笑泯恩讐」的時候了。

有些誤記遺漏之處

我這次拜訪立夫先是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事先安排的，承立夫先生惠予接見，並熱誠招待，立夫先生以九五高齡而精神矍鑠，身體硬朗，讀他的大著，才知道是他養生有道，長期鍛煉的結果。他記得一位老方丈告訴他的一句箴言：「養身在動，養心在靜，這確是體養身心的至理名言。」

對於立夫先生《成敗之鑑》這本大著，我本不想寫什麼書評，不過立夫先生究竟年事已高，不免有些誤記或遺漏之處，略述所見

(一)陳書中說，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時，周恩來已在西安，書中說：「在西安事變前，國共已有談判，與中共交涉時，我方代表是我和張沖，中共派代表是周恩來。這項談判，必須有第三國代表參加，即就是潘漢年。」又說：「經多次協商，宣言及條件的文字都已大體談妥，周恩來就想回延安覆命，我命張沖陪他在西安，順便見張學良，由周口中說出，我們雙方對共同抗日，大致已有協議，以免張學良再唱抗日高調，藉以保存實力。潘屬則留京滬續洽，不料事隔幾天，西安事變忽起，當時張沖、周恩來都在西安」。

(見陳著153頁)

這一段卻是立夫先生完全記錯了。第一、西安事變時，周恩來根本不在西安。周是在西安事變後，張學良和楊虎城兩將軍聯名電請中共中央派全權代表來西安，共商救國大計，中共才派周恩來為代表，於十二月十七日抵達西安的。在西安事變前，國共雙方已有談判，確是事實。潘漢年去南京與張沖有會談也是事實，但中共去南京會談的代表不是周恩來。周恩來在紅軍長征抵達廬山後，一直在解放區，他是「七七」事變後，於一九三七年七八月間抵達南京的（國共第二次合作，中共派周恩來，朱德、葉劍英三人去南京）。而且如果張學良早知道，國共已有妥洽條件共同抗日，他也不致發動西安事變了。西安事變是由于張學良苦勸蔣介石放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被蔣介石所責罵而被逼出此「兵諫」之舉，這是舉世周知的事。所以陳書所述顯然與歷史事實不符。

冀朝鼎不是重要人物

(二)「陳」書中總結國民黨在抗戰勝利後，國共戰爭中失敗的原因，說在經濟上是「冀朝鼎禍國陰謀之得逞」（見該書338頁）。這也是很可笑的誤會。冀朝鼎是地下黨員，他是孔祥熙的同鄉，深得孔的信任，這是事實。但冀在國民黨的地位是很低的，他不過是中央銀行經濟研究所的一個所長，他根本不可能參與國民黨財經政策的機密。國民黨在抗戰勝利後，經濟上之失策是發行金圓券，而金圓券是王雲五出的最大餽王意與冀朝鼎無關。而且冀在中共建政後，也沒有被毛任為財政部主要職位。（陳書339頁）

冀朝鼎是我的老朋友，他英文很好，在美國加入了美共，然後轉為中共的。中共建政後，他被任命為「外資企業局局長」，我是中共私營企業局副局長，兩局都是政務院直屬機構。不久外資企業一一被消滅，外資局也就合併到我的私企局來了。我在「私企局」增設一個「外資企業處」，以處理一些外資企業的遺留問題。冀朝鼎也離開了外資局當周總理的外交幕僚了。所以冀朝鼎從未被毛當為財政重要幹部使用過。冀朝鼎的父親冀貢泉是國學家，曾任北京大學國文系主任，後來北京大學改組，冀老先生職位動搖，冀朝鼎還找我幫忙過，可見冀在中共的地位不是很高的。我也從未聽說過冀在國民黨工作時出過什麼壞主意使國民黨垮台而得到中共的賞識。這真是天方夜譚了！

國民黨敗在喪失民心

(三)陳書中說，國民黨軍事方面的錯誤是「由於受了國防部次長共奸劉斐的影響，不要這些游擊隊的兵」（見該書336頁）。按劉斐，字維章，湖南人，根本不是共產黨。他與廣西的李、白關係相當不錯，他之任和談代表是李宗仁的意思。把劉斐說成「共奸」是不符合事實的。

立夫先生總結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教訓說：「苟軍事方面不自大輕敵，處理游擊隊有方，經濟財政方面，不採取措施，造成民怨；外交方面不使美居間，予共黨以爭取時間良機；黨務方面，不讓反黨以國大席位，及早告知李宗仁此次不要參加競選，則大陸之失，必能避免」。（p.456）

對於立夫先生這個總結，我是不能同意的。但令我特別感到驚異的是立夫先生竟無一語道及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官員的貪污腐化，喪失民心。勝利之後，國民黨接收大員的「五子登科」，大發接收財，淪陷區人民若大旱之望雲霓，好不容易盼望到抗戰的勝利，

而國民黨官員之貪污腐敗，尤甚於日敵統治時代，這是國民黨失敗的主要原因。而立夫先生竟無一語道及，豈不令人驚異！雖然立夫先生繼著說：政權之維持，不能靠軍隊，如施政有違民心，終必失敗。蓋軍隊亦為人民所組成，而違民意之措施。乃自殺也。「兵敗如山倒」者，無鬥志以擁護其不願擁護之政權也，故曰「得民心者斯得民矣」（p.56）立夫先生後面這一段話是完全正確的，國民黨在大陸政權之所以喪失，主要是由於喪失民心，而喪失民心的主要原因我認為並非如上述的軍事，財經、外交、黨務種種方面之失策，而是國民黨的貪污腐化。而國民黨當局的貪污腐化，以權謀私，孔宋兩家族是不能辭其咎的。立夫先生對於宋子文頗為不滿，在書中對宋處處有微辭。獨對於孔祥熙，則加以維護。而孔之聚斂貨財不亞於宋，而昏庸則有過之。這些難道不是鐵的事實嗎！

四大家族之真像

最後我要談一談所謂「四大家族」問題。「四大家族」，即指蔣宋孔陳而言，這是陳伯達的一本著作《中國的四大家族》說的。陳書在中國大陸流傳甚廣，因而「四大家族」一辭亦膾炙人口。其實，我早就知道，「四大家族」，陳氏一家是冤枉的。陳氏兄弟（果夫、立夫）並沒有錢，中國農民銀行亦非陳家祖產。

立夫先生退出中國政治舞台後，曾在海外養雞並維持生計，而辦養雞場的資金還是靠舉債而成。（立夫先生在美國購買一個較便宜的雞場，成交要四萬七千元美金。先付二萬元，其餘分期十年付清。而立夫先生手中只有四千元，不是一萬六千元，孔祥熙借他八千元，與他合作辦雞場的胡定安拿四千元，共餘四千元還是向朋友幫忙的）。這可以充分證明，所謂「四大家族」，陳氏一家是冤枉的。不過陳伯達的「四大家族」一書，並沒有什麼學術價值，這是一本政治宣傳品。像這一類政治宣傳品，在中國大陸真是觸目皆是，不足為奇。

對中國文化見解獨到

立夫先生在辦養雞場時說了幾句牢騷話。他說：「我為什麼要選擇養雞行業呢？因為我想替政府已工作了這麼多年，伺候了蔣公和黨內外不少人，而竟不受謫解。此後我將不再伺候任何人！那麼去照料雞沒有這種感覺了。」陳氏兄弟為國民黨忠心耿耿地工作了幾十年，而竟不見諒於蔣公和國民黨，原因何在，難道不值得立夫先生反省一下嗎？

我始終認為，國民黨政權大陸之所以失敗，主要是由於喪失民心，而喪失民心，則中統與軍統兩個法西斯特務組織實不能辭其咎。而立夫先生作為中統的主要創辦人，非但不能見諒於敵黨（中共），亦不能見諒於蔣公，這不值得立夫先生深思嗎！

立夫先生晚年宣揚中國文化把中國文化的精義歸納為「公」「誠」「仁」「中」「行」五個方面，他著有四書道貫一冊，還有其他數十種著作，都是與中國文化密切有關的；他認為中國文化乃以「人」為中心，以「誠」為基礎，故應為人類所共同喜愛的文化。我基本上同意立夫先生對中國文化的看法，認為有獨到的見解。

立夫先生是個歷史人物，其是非功過，後人必有公論。也許他對文化方面的貢獻（如發明中國文字分類系統，與王雲五的四角號碼齊名）遠遠大過於他對黨務的貢獻。質之立夫先生以為如何？（小標題為編者所加）